迈阿密公寓楼坍塌：“向钱看”酿成的苦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胡文利

当地时间6月24日凌晨1时20分左右，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瑟夫赛德镇尚普兰南塔公寓楼4楼，凯茜·斯特拉顿在和丈夫煲电话粥时，眼瞅着窗外的泳池塌陷，地面出现一个大洞。

凯茜·斯特拉顿的手机在她发出一声尖叫之后再也没有接通过。监控视频显示，不到20秒时间，这座13层公寓楼的大半个楼身就灰飞烟灭，55套公寓化为乌有。迄今为止，尚普兰南塔公寓楼坍塌事故导致至少36人死亡，109人下落不明，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建筑事故之一。

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在整个迈阿密地区，与尚普兰南塔同期修建的楼房还有很多，有些甚至更早。此次坍塌事故，引起了人们对该地区楼房实际寿命的怀疑、对安全问题的担忧。7月2日，距尚普兰南塔约8公里的另一座公寓楼，居民被紧急疏散。报告显示，这座楼房有“严重的结构和电气安全隐患”，即将到来的飓风加大了楼房倒塌的可能性。瑟夫赛德政府当局下令，对当地房龄40年以上的所有建筑进行安全检查。

要彻底查明尚普兰南塔公寓楼坍塌事故的原因，尚有待时日。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莫斯建筑学院院长阿托罗德·阿齐齐纳米尼表示，从已知情况来看，尚普兰南塔事故与其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不如说是一场酝酿已久的人祸。政策监管漏洞、多年疏于养护、政府反应迟缓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这场悲剧。

瑟夫赛德是一个约有5600人的小镇，位于比斯坎湾和大西洋之间填海形成的狭长半岛上，共有8个街区。尚普兰南塔位于小镇南端，与其他建筑一样，日复一日地经受着海浪拍打、富含海盐的空气氤氲和大西洋飓风的侵袭。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瑟夫赛德地区普遍存在沉降现象，其中尚普兰南塔尤为严重。根据佛罗里达国际大学2020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尚普兰南塔就以每年两毫米的速度下沉。海水侵蚀与地面沉降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这个地区建筑物的楼身出现裂缝，并出现结构错位。

迈阿密房地产业成“洗钱”渠道

在这样一个看似不宜大兴土木的地方，为何会出现大量居民社区？这要追溯到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疯狂的“可卡因牛仔”时期。

在光鲜的外衣之下，迈阿密其实是犯罪分子的天堂。从上世纪70年代起，由于地理位置便利，迈阿密逐渐成为毒品进入美国的中转地。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迈阿密地区集中了全美70%的可卡因、70%的大麻和90%的安眠酮交易。纪录片《可卡因牛仔》表现的，正是这一时期迈阿密贩毒活动与经济发展的联系——犯罪分子把从毒品市场赚来的黑钱‘洗白’，然后进行再投资，由此推动了当地经济繁荣。

在当地所有行业中，最适合“洗钱”的就是房地产业。“拉美毒枭们把迈阿密变为他们的（犯罪）活动中心后，向当地经济注入了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进了房地产业。”迈阿密大学法学院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美国对房地产业的监管要宽松得多。以金融业为例，如果银行怀疑客户存款来路不正或是贪腐资金，需要向美国财政部提交“可疑活动报告”。但房地产等产业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在迈阿密投资房地产，另一个便利之处是无需实名。通过法人公司购置房地产的个人无须公开名字，只需公开持有该房地产的公司的名称，很多人会注册“空壳”公司以公司名义投资或购置房产。近年来，位于迈阿密阳光岛海滩的保时捷设计大厦，曾被曝卷入一桩金额达10亿美元的洗钱案。美国联邦调查局查出，一名厄瓜多尔石油企业高管名下有用赃款购买的6处豪宅。佛罗里达国际大学2020年发布的那份调查报告中说：“由于政府监管不足，让（迈阿密）房地产成为最受欢迎的洗钱手段。”

利用法人公司的名义投资房地产，还有个原因是税收优惠。许多企业不用纳税，而是把利润和亏损都“过户”给企业所有者，由他们申报纳税。尚普兰塔的开发商之一、加拿大人内森·赖伯就深谙偷税漏税之道。据加拿大《汉密尔顿观察者报》报道，此人曾是多伦多的一名律师，上世纪80年代初因偷税漏税在加拿大国内受到指控，随后逃往迈阿密，与他人合伙开发了尚普兰南塔和北塔。这样一个人，到美国后却摇身一变，成为迈阿密有名的慈善家。他在美国并没有受到任何调查、指控或引渡，直到1996年他主动回国投案。

7月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瑟夫赛德镇，救援人员经过住宅楼局部坍塌事故现场的废墟。赛德镇住宅楼局部坍塌事故死亡人数6日升至36人，仍有109人失联。 新华社/法新

毒品打造的‘城市天际线’

美国政府筑起森严的边境墙，把那些为讨生活背井离乡的移民挡在高墙外，却允许犯罪分子的黑钱源源不断地涌入本地市场。形形色色的人把带着原罪的资本注入当地经济，并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野蛮生长。当美国房地产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萎靡不振、建筑业普遍陷入停滞时，迈阿密政府却发放了1万多份建筑许可证，20多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可卡因是建造这座‘城市天际线’的货币。”在纪录片《可卡因牛仔》中，时任迈阿密市长亚历克斯·达乌德望着比斯坎湾海岸的高楼大厦说。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调查报告还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毒品经济为迈阿密创造了2.5万个岗位，仅戴德县每年就因毒品交易增加4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由于房地产交易多用现金，当时迈阿密联邦储备银行“有5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超过全美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总和，大多是贩毒常用的50美元和100美元钞票”，“从执法部门到房地产，再到银行业，黑钱污染了一切”。

重资本、轻监管，漠视生命

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填海造地、沙滩盖楼等现象屡见不鲜。2019年，尚普兰南塔附近一幢18层新楼开始动工，在该楼施工过程中，居民曾向当局反映他们感受到了“震动和摇晃”，但当局只是敷衍地告诉他们“注意观察”。

安全警钟其实早已敲响。2018年，瑟夫赛德政府收到一份来自莫拉比托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尚普兰南塔的混凝土柱、承重梁、钢筋和墙壁都出现了大量裂缝和磨损，停车场入口坡道、游泳池甲板等处尤为严重，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损坏”，必须及时修复。然而，当局对如此急迫的警告仍充耳不闻，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令人叹息的是，在尚普兰南塔公寓楼坍塌后，至今没有一人获救。由于救援程序繁琐、办事效率低下，宝贵的救援时间被浪费。偶尔从地下传出来的求救声，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归于沉寂。当地时间7月4日，当地政府以“残余楼体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将尚普兰南塔彻底炸为平地。

这场灾难又一次证明，“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机制，并不是万能灵药。美国政府重资本、轻监管，最终酿成了今天的苦果。最沉重的代价，却要由美国人民承担——他们失去了家园、家人甚至生命。

本报北京7月7日电

美军撤离阿富汗 比越南战败时还恶劣的逃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美军加速从阿富汗撤离，令阿富汗安全局势急速恶化，“因撤生乱、因撤生战”的连锁效应日渐显现。

7月6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从阿富汗军方和政府消息渠道得知，由于美军撤离阿富汗过于匆忙，有超过7000名包括“基地”组织、塔利班高官和毒枭在内的恐怖嫌犯、重犯头目，被“扔”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防范薄弱的监狱内。这些人随时可能越狱。一旦他们重获自由，阿富汗极可能重新成为“恐怖分子的天堂”。而且，这个基地一旦被塔利班接管，美国在阿富汗长达19年的“反恐战争”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笑话。

7000名重犯一夜之间进入“管理真空”

距喀布尔一小时车程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不仅是驻阿富汗北约联军最大的军事基地和指挥中心，同时也是北约联军拘禁重大嫌犯的最大处所。7月2日，驻扎该基地的最后一批美军完成撤离，基地内的7000名重犯顿时进入“管理真空”。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里的帕尔万拘留所，一直是包括美军在内的联军在阿富汗最大的重犯拘禁地。联军在阿富汗反恐作战中逮捕的重要嫌犯，几乎全都被送到那里，少数更重要的嫌犯才会被押送到古巴关塔那摩。”阿富汗政府官员7月6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透露，关押在此地的多达7000名重犯，一直被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视为19年反恐战争的最大成果。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帕尔万拘留所内关押的重犯就有5000多名，其中包括数百名刑事犯罪分子，其余全部是恐怖嫌犯。协助管理拘留所的帕尔万省地方安全官员则透露，这里关押的嫌犯中，包括不少“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大人物”，还有许多名扬阿富汗乃至全世界的大毒枭。

帕尔万拘留所的管理权，表面上早在2013年就移交给了阿富汗国民军，但其管理与控制权却始终掌握在美军手里。直到上周五（7月2日）美军官兵开车离开后数小时，阿富汗国民军才知悉。一名阿富汗国民军高级军官愤怒地说，“他们（美军）甚至没有把重犯名单交给我们，也没有说明哪些人关在哪个牢房。”美联社7月6日报道也透露，美军不辞而别后、阿富汗政府军进驻之前，一伙抢劫者闯入基地洗劫了营房，仓库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美国军方发言人桑尼·莱格特上校并未理会阿军指挥官的抱怨，仅是辩称，基地移交工作早在今年4月发布撤军决定时就已开始，美军也就撤离工作与阿富汗领导人进行了协调。

恐怖嫌犯如越狱 对全球安全也是隐患

3000名阿富汗国民军官兵现在已经正式进驻和接管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但让阿富汗政府和国民军指挥层极度不满的是，他们甚至缺乏巴格拉姆基地的规划图，完全不知道基地不同区域的用途、安防弱点，以及各项基础设施运转是否正常。

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拘留所内关押着许多‘高价值’嫌犯。尽管美军撤离得很突然，但我们有足够信心确保他们不会越狱，以此保护我们反恐战争的成果。”但阿富汗许多安全官员和观察人士对此并不乐观。喀布尔大学一位阿富汗局势观察研究者7月6日表示，塔利班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南部的坎大哈省和赫尔曼德省，北部的许多省份也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其前锋部队已经抵达喀布尔郊区，阿富汗政府根本不可能有更多安全作战力量来管理如此庞大数量的嫌犯。这些被拘禁多年的嫌犯一旦越狱成功，势必成为塔利班等组织的骨干力量，阿富汗安全局势会因此加速恶化。

“如果越狱事件真的发生，遭受安全威胁的远不止是我们阿富汗。”一位匿名阿富汗政府官员7月6日表示，“在长期拘押期间，这些嫌犯受到了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反复审讯，饱受肉体与精神折磨。一些人可能会精神崩溃，更多人会变得更加仇视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他们会更加坚定地向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利益目标发起新的恐怖袭击。美国人如此突然地逃离，对全球安全是极不负责任的。”

完全失败的“逃离阿富汗”行动

3个月前，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在今年9月11日前撤离所有驻阿富汗美军，因为美国在阿富汗长达19年的“反恐战争”已经取得了“战略性胜利”。在美军撤离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之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7月2日表示，驻阿美军预计将在8月底之前完全撤出，较预设的9月11日撤离期限提前。

尽管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美国上下都真心希望美军离开阿富汗，但对于美军如此狼狈地撤离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各方仍然感到始料未及。曾在阿富汗作战多年的一位匿名美军少将对美国媒体表示：“这样的撤离不能算是撤离，完全是仓皇逃离。我们抛下了并肩作战多年的阿富汗国民军，抛弃了多年来支持美军的当地人、亲美的所有力量，乃至阿富汗整个国家。这样的举动，让支持美国的人可能不再相信美国。这是一个比越南战败撤离时还要恶劣的事件。”

急剧恶化的阿富汗安全局势，不仅暴露了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对阿富汗根本没有长远战略，漫长反恐战争的恶果还将对中亚、南亚乃至全球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7月5日，阿富汗的邻国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表示，与塔利班发生一场夜间冲突后，1037名阿富汗政府军官兵逃到了塔吉克斯坦境内。该委员会称，塔利班已经“完全控制”了阿富汗东北部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巴达赫尚省的六个地区。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奥斯汀·斯科特·米勒日前警告说，若按目前的情况继续发展，“阿富汗将走向内战”。美国情报界则评估认为，阿富汗政府在美军完全撤出后半年之内就会垮台。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7月3日在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在阿富汗问题上，最紧迫的任务是保持局势稳定，防止发生战乱。美国作为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应以负责任的方式确保局势平稳过渡，不能甩锅推责、一走了之，不能因撤生乱、因撤生战。

本报北京7月7日电

日本朝野深度介入缅甸政局

中青报·中青网驻日本记者 张建墅

日本媒体和高官日前公布的一个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与缅甸局势有关的‘事态’，加上此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对缅甸政局动荡介入颇深。

《朝日新闻》等日媒7月4日报道，缅甸军警今年4月17日深夜曾以追逃为由，强行搜查了日驻缅大使馆馆员和国际协力机构（JICA）职员的寓所，一度出现军警枪口对着日本职员家属的场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7月5日在记者会上证实了此事，他说，缅方行动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可能危及在缅日本人的安全，日方当时已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民众对上述消息感到非常不满，毕竟日本连年对缅提供大量“政府开发援助”（ODA），他们认为缅方粗暴对待日方人员是‘恩将仇报’。

缅甸政局2月初出现动荡之后，日本早早介入其中。日本政府高层多次发声，敦促缅甸军方当局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人物，日媒也纷纷将事态表述为‘军事政变’。麒麟控股集团早在2月5日就率先宣布解除与缅甸企业合作的意向。日驻缅大使丸山市郎突破外交禁忌，2月20日走到大使馆门外，直接接触聚集在那里的抗议者。日本政府不顾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多次批准在日缅人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外务大臣茂木敏充5月21日称，缅甸当局如不‘改善持续镇压市民的情况’，日方将考虑全面停止对缅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记者’也活跃在缅甸示威抗议活动的‘最前线’。日本经济新闻社前记者、后赴缅自任主编经营日语刊物成为‘自由记者’的北角裕树，2月26日被缅甸警方直接揪出示威抗议人群，当天获释后继续活跃在抗议活动的第一线。4月18日，北角裕树因散布虚假消息被缅甸军警逮捕，后被驱逐出境。据悉，为‘营救’北角裕树，日方请与缅甸交往较多的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出面说情，缅方考虑到缅日两国此前是友好关系，顾及两国未来关系，才没有对北角裕树进行追诉。

今年5月，缅甸国家男子足球队赴日参加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小组赛时，发生了缅甸球员叛逃日本的事件。缅甸队守门员派良雄先是在5月28日的赛前唱国歌环节摆出特定抗议手势，后以‘存在生命危险’为由谋求滞留日本。一些日媒、在日缅人、非政府组织等粉墨登场，呼吁日本政府‘格外开恩’批准派良雄在日‘政治避难’。6月17日缅甸男足从关西机场离境，派良雄则在一些人的劝诱之下‘自主选择’留在日本。派良雄近期多次出现在包括日本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的聚光灯下，谈论他如何受到缅甸方面的‘压制迫害’，如何向往‘自由民主生活’。

日本深度介入缅甸政局的后果现在还很难判断。日本政府现在主动披露缅甸军警搜查日方职员寓所的消息，意图恐怕与往常有所不同。以往对待一些近邻国家相关事态时，日方多是出于挑唆邻国民意、配合政府推进特定内政外交步骤的用意。这一次，则可能是对其介入缅甸局势有所‘反思’，不得不暗示国内对缅舆论‘刹车’，希望避免在缅日本人再次因不当行为受到缅方的‘礼遇’，更避免过度影响日本在其传统势力范围缅甸的存在和利益。

本报东京7月7日电

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多边主义

7月7日，韩国首尔市民排队进行新冠病毒检测。韩国7月6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200例，是去年12月25日后6个月来的最高纪录，也是今年1月4日以后单日新增病例数首次过千例。韩国舆论担心“第四波大流行”在本国已经开始。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纵观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冲突和治理困境，追根究底，还是在于多边主义理念没有得到有效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准则没有得到充分尊重。”7月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长期以来，多边主义和世界和平都是世人长期关切的议题。然而，面对全球大灾疫与百年大变局叠加交织，经济衰退、意识形态偏见和发展鸿沟等全球性挑战愈发凸显，多边主义同单边主义的激烈博弈加剧，全球治理体系频受冲击。

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在后疫情时代继续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成为近日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的核心议题。多国前政要、驻华使节和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活动。

法国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在论坛上指出：“在目前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要有一个共赢的概念，没有人会成为零和游戏的赢家。”

外交学院院长徐坚认为，多边主义面临冲击的原因，一方面是很多西方国家因国内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问题陷入混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国竞争和摩擦加剧，地缘政治矛盾和大国关系日益紧张。

多边主义不应是任何国家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什么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在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看来，核心要义有三点：第一，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第二，应该建立起全球伙伴关系，唯有动员起全球力量，才能解决全球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联合国成员国必须遵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实现所有人的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指出，要倡导和践行与“排他性多边主义”或“竞争性多边主义”截然不同的“包容性多边主义”，“要让包容性多边主义惠及世界各国。”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表达了与杨洁勉类似的观点。她说：“多边主义体现的是平等、互利和开放的原则，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力求在最大程度上照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傅莹认为，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最大的遗憾是多边主义精神的缺位，“大国乃至国际机制未能发挥足够的凝聚作用来调动国际抗疫合作。”她提醒说，多边主义不应该是实现独家目标的手段，不能只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时甚至需要出让一定的利益，通过利他和维护多方利益，实现更为宏大的利益需求。傅莹强调：“中国不希望多边主义成为任何国家谋求国家利益的工具。”

区域合作和多边主义相辅相成

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的判断中，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速度，会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与之相对应，区域合作和区域治理的进程将会加快。

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区域合作受到严重阻碍，甚至区域合作的“样板”欧盟都未能在抗疫中表现出区域合作的力量。在新的国际和区域形势下，区域合作的理念和方式也必须进行创新，才能够发挥出新的作用。

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主张加速地区经济一体化、自由化进程，积极推动实现东盟自由贸易区，以维护东盟团结与合作，推动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此次大会上发表视频演讲时，吴作栋再次强调了重振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亚洲面临很多严峻挑战，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造成的竞争以及宏观经济风险等。”吴作栋表示，“这意味着，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区域合作。所有亚洲国家都应携手朝向共同目标迈进。”

对于如何重振亚洲区域合作，吴作栋提出了三个“额外原则”：扩大合作、减少纷争；共同繁荣，而不是以邻为壑；以史为鉴，而不是被历史所束缚。在他看来，“一个繁荣的亚洲，应是创新的、具有包容性的亚洲。各国应携起手来，通过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果实。”吴作栋同时强调，“中国是亚洲未来的关键，也是重振区域合作的关键。”

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将区域合作的概念理解为“多边主义的区域化”。在他看来，区域合作和多边主义是相辅相成的。素拉杰在视频演讲中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区域合作、国际合作的典范和重要支柱。

重建大国信任对多边主义至关重要

尽管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挑战，各国对于国际规则的理解也存有分歧，但是，重建大国之间的信任对多边主义至关重要，是参加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的各国与会者普遍的共识。

欧洲理事会原主席范龙佩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国与国可能是竞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就是彼此的敌人。在某些严格界定或明确界定的领域或项目上，大家同样可以是战略伙伴。

说起重塑大国关系、重建大国信任，中美关系如何才能回到正常轨道，无疑是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参会者最关注的议题。比如素拉杰就直言，要加强多边主义，中美关系稳定是关键。

吴心伯认为：“美国得接受、适应中国赶上来、成为美国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事实或可能性。美国政治家的心态，对于未来决策非常重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认为：“拜登政府跟特朗普政府一样，还没有想好究竟应如何跟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打交道。”

中美需要合作，几乎是与会所有人士的共识。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柯有为在论坛发言中明确表示，美中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与中国合作符合美国利益。前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提出，要从决心和结果出发，用更合理的外交方式来管控中美分歧。袁鹏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尊重。

不能同中国“脱钩”、期待中国在多边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包括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澜意、墨西哥驻华大使贝尔纳尔等在内的驻华使节和多国学者的一致呼声。杰尼索夫说：“中俄之间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照顾共同利益，不干预彼此内政，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国家，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面对时代变化的挑战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世界上的大国必须增强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必须以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与进步的目标为己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在论坛上表示，要共建均衡稳定互利的大国关系新格局，各国之间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伴、与时俱进、勇于对话、互利合作，以及共同担当。